

ZHONGGUO

MINJIAN WENHUA TANSUO CONGSHU

眼光向下的革命

——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

赵世瑜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

民间文化

探索丛书



YANGUANG XIANGXIADÉ GEMING

YANGUANG XIANGXIADÉ GEMING

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

眼光向下的革命

——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

ZHONGGUO MINJIAN WENHUA
TANSUO CONGSHU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
/赵世瑜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0
(中国民间文化探索丛书)
ISBN 7-303-04802-2

I. 眼… II. 赵… III. 民俗学-思想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K89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2098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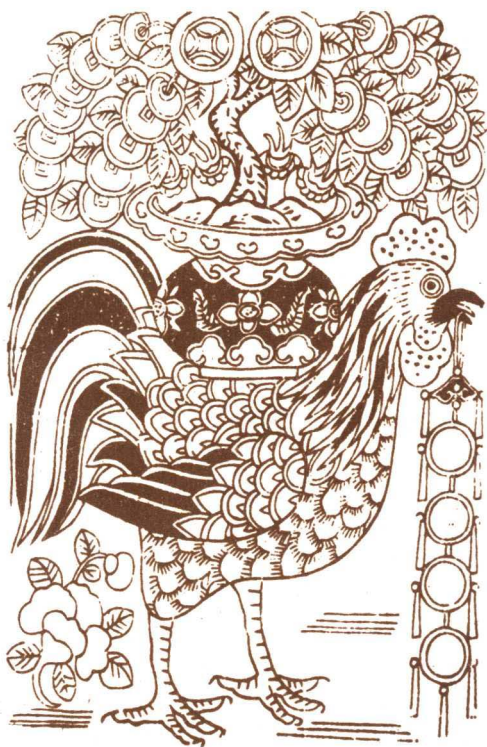
出版人：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0.375 字数：260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16.00元



总序

(一)

人类的一切文化都是为满足一定群体生存、发展的要求,而产生、存在、传承和演变的。民俗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它当然也是遵循着这种规律而产生和发展的。

民俗文化是在一定群体成员生活中,最基础的,也是极重要的一种文化。因为世上没有比民俗文化,更为广泛地紧贴群众生活、渗透群众生活的文化现象了。

从考古学上的资料看,远在旧石器时代,在那些过着原始生活的人群里,就有一些最简单的习惯存在,即后来民俗的幼苗存在。随着他们生活的不断前进,原始的习惯就更加增添和巩固起来了。

人类群体在进入有文字、制陶术、冶金术的所谓文明时期的社会后,这种风俗、习惯,当然就会随着社会脚步不断前进。同时,由于群体的分化(阶级产生),本来全民性的风习,也随着产生了一定的分化状态。但是历史沿袭下来的习俗,在整个民族文化生活中,仍然是主体,是基础。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在广大的农村、小市镇的民俗文化状态基本

上还是如此。

在已经进入文明时期的社会，上层文化的保存和继承，大都凭借文字记录。但是广大民众没有学习和使用文字的机会，他们的民俗传承，只有依靠历史因袭的形式，即行动传承、口头传承和心理传承。这些传承往往是互相关联和交错。这种传承方式形成了民间文化的重要特点——与文籍文化相对立的民间传承文化。

民俗文化是对应群体人们的需要而产生的。人们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从基本物质生活的需要到各种精神生活的需要），为它们而产生和存在的民俗文化的机能，自然不可能是单纯的、独一的。但是，这种功能概略地总括起来，不外两点——顺利生活和轨范生活。

（二）

民俗学，是以上述那种文化为对象而进行考察、描述和研究的学问。我国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学，虽然历史不到百年，但是它的史前史却是源远流长的。

仅从历史文献看，我国在先秦的载籍中就有许多关于古代民俗事象的记录或断片的论述，甚至于有比较集中的资料辑集，如《诗经》中的国风部分和《山海经》。东汉、西晋以来，

关于民俗的谈论和描述著作就相继出现了。到了宋、元时代，不仅本土的民俗著作不断涌现，连关于域外的民族地区的民俗记述著作也相继刊行了。中国这方面著述的丰富，恐怕在世界上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诞生于本世纪一十年代之末（1918年）。它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翼而产生和存在的。它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历了八十年的岁月。

中国民俗学的经历，虽然总的说来，是在前进，但行程上却是相当曲折的。二十年来，由于学术环境的宽舒，学界同志们热心努力，这学科已然呈现出喜人的景象。

当前，我们这个学科，各方面都有新的进展。学术机构遍立于各省市，专业队伍扩大和加强了，各种层次的著作也都出现在书店和图书馆中。更使人高兴的，是这个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学科，被教育部正式列入高等院校（包括研究院）学生学习和研究的科目中。民俗学一时差不多成为了时代的“显学”。

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成立已经四年。它是一个专门培养民俗学人才和进行这方面学术研究的机构。这套丛书就是它的成员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的成果并不十分成熟。但我们从事学术的心是诚挚的，进行研究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如果这份学术的礼物，能够作为一捆柴、一把草，投向正在熊熊燃烧的民俗学的洪炉中，为它增添一股热力、一点火焰，那就是我们的无上光荣了。

钟敬文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日于北师大

时年九六

自序

本书是关于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的历史研究。确切地说，它不完全是对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兴起之后一切有关人和事的叙述史，而主要是思想史、问题史。本书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已有学者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做了一般的和资料性的爬梳和勾勒，这里所做的工作自然不能是重复劳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国际历史学界，“已经发生了有时不为人所意识到的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的转变。”^①

这一转变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历史研究的对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简单地描述过去的做法已为许多人放弃，他们开始从概念建构或者问题出发，去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此外，传统的政治史料有助于揭示某些个别的事实，但却不利于把握规律和构造模式，为了扩大史料视野，史学家必须按照一定的意义网络去重新发现和组织新的、可供解释问题的史料。因此，问题

^①弗朗索瓦·菲雷(F. Furet). 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 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 中文1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23~236

史或概念化史学更强调解释而非描述，同时为支持这些解释寻找围绕某问题而出现的历史事实。

如果说问题史是本书采取的认识论立场的话，那么思想史则是本书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这里所谓的“思想史”，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说的史学的专门研究观念形态的那个分支，它如同社会史一样，指的是一种新型的史学（a new genre of history）。也就是说，它是从人的思想（idea）、心灵（mind）或精神（spirit）入手、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从政治的或经济的角度，去重新诠释历史。当然，这里的所谓思想的或政治的或经济的角度或者立场，绝不是从终极的因果意义上运用的。这里的思想史通过考察个人的心灵，群体的观点以及某种思想产品的缘起和影响，探讨思想的相互关联的结构、思想交流手段对思想产品的重要性，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内在的自我促进因素等等^①。因此，尽管本书的研究对象仍然较多关注知识精英，与新思想史把分析的对象从杰出人物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集团的主张看似矛盾，但由于这里是进一步对前辈学者们开辟民俗学发展道路的思想文化背景，他们从事民俗学事业的思想动机、他们在有关民俗学理论问题上的思考加以分析，意在揭示学者们的思想与社会思潮，与民众思想的互动，所以还是与上述思想史的发展取向相一致的。

由于1918年到1937年这20年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时期，由于目前对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理论性的

^①Felix Gilbert. *Intellectual History: Its Aims and Methods*. In Felix Gilbert, Stephen R. Graubard, ed.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2. 141~158 (菲利克斯·吉尔伯特·思想史的目的与方法·见菲利克斯·吉尔伯特与斯蒂芬·格劳巴尔德编·今日史学研究·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 141~158)

探讨相对减少，而且对沦陷区和国统区、甚至解放区的民俗学工作之评价，还需要做较大量的工作，由于1949年以来系统全面的民俗学工作在一段时间内陷于停顿，本书特将探讨的时间范围限制在这样一个时期内，其它时段的情况将留待今后另行研究。

中国现代民俗学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从晚明到清中叶，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内在的结构性变动，而到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东渐之后，使原来的内部变化被引入了一条新的轨道，即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轨道，与中国的“传统内变迁”结合纠缠在一起。这种内部发展的原动力和外力双重的推动，就构成了中国的变化，中国现代民俗学在产生过程中，与作为它的母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都带有这样双重的特点。

与社会的整体变动相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也具有同样的双重特点。一方面是思想启蒙，从明末清初的异端思想，到晚清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解放思潮，包括变法维新思潮、君主立宪思潮等，另一方面是在西方势力东来的背景下出现的爱国主义思潮，在清末民国初，除了“振兴中华”，“救亡图存”的浪潮遍及全国外，还包括国粹派“复兴古学”的思潮，教育救国及实业救国思潮等。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无疑是这些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思潮之组成部分。此外，从晚明到晚清，中国同时经历了民间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各种民间文化形式积极生动地体现在学者们面前，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也使人们无法忽视下层民众在社会上的力量，使他们对民众的生活和文化更加密切地加以关注。这些则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思考的问题和研究对象。

除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外，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出现还具有明确的学术渊源。在中国历史上，统治的需要，社会教化的需要、移风易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和传统学术“博物”的

知识结构需求，都促成了对记录民俗事象的重视。到晚清时期，尽管西学传入，学者看待民俗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更新，但在他们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上述因素的强烈影响。同时在新的形势下，在继承上述传统的同时，也有许多新的见解。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学术中对民俗的重视，一直包含着许多宝贵的思想，包括民主意识、功能意识，求知意识和实践意识。这种初步的民俗学意识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先驱们来说，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学术“潜意识”。一旦某种现代学术意识从外部刺激了他们的这种“潜意识”，就立刻会引起巨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馈。

与此同时，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创始之际，人们虽也受到西方民俗学的影响，但更多地还是受到西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影响。即使在西方，民俗学意识及学科的产生，也是不同的学科在人文主义思想和对世界的深刻认识的前提下，强调民族和民众的重要性的产物。因此中国现代民俗学道路开辟者的学科意识，是在西方近代学术和思想传统的总体影响下产生的。这种现象不仅可以解释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其形成之初，所受西方学术的影响为什么不只是纯粹的民俗学的，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语言学家共同加入到民俗学研究队伍中去的原因所在。

在明确了中国现代民俗学产生的总背景之后，本书重点剖析了这场运动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包括胡适、周作人、顾颉刚、江绍原、黄石、钟敬文及其他重要人物。其中又重点分析了他们各自投身于民俗学事业的动机，看看他们在同一个战线上，对民俗学的认识和态度有什么样的相同和不同。我们发现，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是现代民俗学的最早倡导者，但由于并非为研究和发发展民俗学而倡导民俗学，使他们在以后的活动中没有什么太多贡献；也有的学者是从历史学、或宗教学、或文学的角度切入民俗

学研究的，有的后来转回到各自的学科领域，也有少数人坚持不懈地在这个园地里耕耘，他们各自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贡献是不同的、独特的，是各有其意义的。我们还发现，中国民俗学早期发展中的多学科参与特点，是特殊的学术背景、学科本身的性质等等因素决定的，尽管对学科的整体发展带来一些局限，但总的来说还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

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除了注意学者的动机和意识以外，更重要的是注意本学科的学术思想状况。本文在关于民俗学的性质、对象、目的、功能、民俗特征和民俗学方法与方法论等问题上，考察了在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民俗学界的认识水平。由于采取历史主义的评价尺度，把关于以上问题的认识放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和世界民俗学界的整体发展水平中来认识，由于我们把这一时期的认识与以后 40 年中国大陆本学科的认识相比较，我们发现，当时的探讨还是具有一定深度的，至少对西方民俗学、人类学思想的吸收和消化还是及时的、迅速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关于这些方面的探讨体现了他们对新事物的勇于和乐于接受，可能尽管稚嫩，但这种勇气和追求真理的决心是以后的许多人所不能比拟的。对于少数人来说，比如在民俗学的对象、功能等问题上的认识，一直到今天也还可以说是真知灼见。

当我们重温了中国现代民俗学所走过的早期历程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不开的，它也必然带有后者的特征和性质。它虽脱胎于后者，但又不同于后者，因为后者始终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而中国现代民俗学自其产生之后，便逐渐成为一种学术运动，一场学术革命，然而这并不有损于它的思想革命意义。它不仅向学术界和全社会推出了崭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而且像其它学科的学者一样，力图通过本学科的努力，为解决中国的

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提供自己的帮助。在这方面，中国的民俗学者们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但由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现实，是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使他们不仅无法完全脱离对现实问题的回答，而且对问题的症结有可能认识得更加清楚。虽然中国民俗学家在许多方面并不像俄国的民粹派，但他们在为解决中国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提供答案方面，始终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当然，从今天来看，当年的这场“眼光向下”的革命虽然一改数千年的传统，把关注的对象从帝王将相和文化精英转向了普通的人民大众，已经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这仍只是革命的第一步。从纯粹的学术角度说，我们不仅要“眼光向下”，不仅把目光集中在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那里，还要“自下而上”，即从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或者社会的基层那里出发，反观和改造国家构造和精英文化。也就是说，研究者主体要脱胎换骨，他们从研究精英文化变为研究人民大众，已经很了不起；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仅以精英的角色去研究大众，他们还要以大众的角色和角度去研究大众，甚至研究精英，研究一切：从乡村看城市，从民间社会看国家。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要进行这第二步的革命。而这当然是我们的民俗学前辈所希望的。

目 录

| | |
|-------------------------|----|
| 自 序 | 1 |
| 绪 论 | 1 |
| 一 关于研究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意义 | 2 |
| 二 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研究状况 | 5 |
| 三 关于本书的基本思路、研究框架 及其它 | 13 |
| 上编 时世与英雄(上) |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与社会思潮 | 29 |
| 一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 29 |
| 二 转型时期的社会思潮 | 36 |
| 三 民间文化发展的新高峰 | 40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的学术渊源 | 57 |
| 一 中国的民间文化研究传统 | 58 |
| 二 西方民俗学及相关学科的东渐及其 影响 | 71 |

中编 时世与英雄(下)

第三章 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一) 87

一 胡适与周作人:西方学术思想影响

下的先行者 88

二 “土生土长”的大师顾颉刚 99

三 独辟蹊径的江绍原与黄石 107

第四章 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二) 123

一 走上漫长的驿程——钟敬文 123

二 运动中的其他健将 133

下编 问题与思考

第五章 关于民俗学的性质和对象问题 157

一 早期的朦胧认识 157

二 系统探讨的起步 162

三 30年代前期探讨的继续展开 174

第六章 关于民俗的特征与民俗学的

目的和功能问题 185

| | |
|--|-----|
| 一 关于民俗特征的认识 | 185 |
| 二 关于民俗学的目的与功能问题 | 191 |
| 第七章 关于民俗学的方法论及方法问题 | 207 |
| 一 从今天的认识谈起 | 207 |
| 二 关于民俗学方法论问题 | 210 |
| 三 关于民俗学的方法问题 | 221 |
| 结 语 | 237 |
| 一 思想革命与学术革命 | 238 |
| 二 民众、自我、文化和社会 | 248 |
| 附录一 引用及参见书目 | 261 |
| 附录二 一个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的选择——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周作人与顾颉刚 | 275 |
| 附录三 江绍原与中国现代民俗学 | 285 |
| 附录四 黄石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 | 301 |
| 后 记 | 315 |